

##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在劳动就业、人力资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有不少新的表述和部署。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和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劳动经济研究》编辑部邀请专家学者撰写了一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 把生育支持纳入民生政策体系

蔡 昉\*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这些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中，与提高人民福祉对应的收入水平提高，以及形成与家庭意愿相一致的可持续生育率，是两个有着紧密关系的任务。这是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领域，也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枝叶相连，应该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协同实现。

按照二十大报告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既要借助人口横向流动这一途径，又要求实现人口纵向流动这一目标。通常，这种流动均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实现和衡量。在阻碍社会流动的诸多障碍中，整体上处于拮据状况的家庭预算约束，特别是以往关注较少的家庭时间预算约束，不仅应该名列其中，而且应该予以格外的重视。这是因为家庭预算约束过紧，在空间和时间上均会产生显著的负外部性。也就是说，家庭层面的

---

\*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电子邮箱：caifang@cass.org.cn。

取舍难题，最终将对全社会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所以，问题要得到根本解决，需要借助公共政策职能有所作为，从制度安排上实现一劳永逸。

人口再生产职能的重要环节和主要活动，通常落实到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也就是说，在共同的财务收支预算和时间安排基础上，家庭成员从事消费、储蓄、生育、养育和教育子女、劳动就业、人力资本积累，以及针对“一老一小”和病残家庭成员的照料等活动。家庭的预算约束，通过对这些活动的影响，可以分别促进或阻碍家庭的发展。家庭发展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流动性和居民收入质量的高低，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成色。

从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及比重，以及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来观察，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主体结构还不是一个橄榄型，很多家庭面临着偏紧的财务预算约束。不仅如此，家庭的其他资源预算，同样处于紧约束和紧运行的状态。其中，时间不仅是家庭职能得以履行的不可或缺条件，还通过其特有的一些性质，对家庭发展产生影响。由于时间流逝的不可逆性，所以，每时每刻对于个人的一生来说，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子女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对父母生命的延续，所以是时间最接近于被再生出来的方式。因此，定量观察家庭的时间预算约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现象，得出更为有针对性的政策结论。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2016）”，以及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我们可以实际观察 15~49 岁这个生育年龄人群，特别是其中 20~34 岁这个生育旺盛年龄的家庭时间预算约束。以年龄做基准的劳动收入和家务劳动时间变化，恰好可以反映家庭成员在寻求职业发展与履行家庭照料责任之间的取舍。鉴于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平均为男性的 2.8 倍，在国际比较中处于较高水平，因此，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占比，可以最恰当地认识家庭预算约束这枚硬币的家庭发展侧面。

对个人来说，无论生育期还是生育旺盛期，在年龄上都是同主要的劳动参与期重合的。特别是在整个生育旺盛期，个人劳动收入始终处于攀升期，而一旦达到劳动收入的最高点，则仅仅能够维持数年，从 40 岁开始便迅速降低。与此同时，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也在攀升，并于 30 岁左右达到最高点，在整个生育年龄都保持在这个高水平上。从表面来看，家庭预算约束的拮据似乎是一个无解的两难。一方面，家庭需要兼顾职业发展和家庭发展双重职能，对提高社会流动提出需求；另一方面，雇主追求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似乎也无厚非。找到破解这个难题的出路，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人口再生产责任的本质，重新定义家庭功能和家庭发展对社会整体的含义。

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一个经济学概念，即“鲍莫尔成本病”。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曾经以表演艺术为例，尝试解释一种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滞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现象。与制造业所具有的生产率不断提高和单位成本不断下降特征正相反，表演艺术的生产率始终没有什么显著的提高，结果只能是单位成本的不断上升。不过，既然人们对演出具有实际的甚至是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个行当的实际报酬水平，仍然可以随着全社会报酬水平的提高而水涨船高。也就是说，无论采取何种具体方式解决，表演艺术是依靠生产率的分享而得以存在的。

如果把鲍莫尔讨论的表演艺术改换成家庭发展中的必要活动，譬如以家庭照料为代表，破解家庭两难抉择的思路就可以清晰起来。不仅如此，如果说社会对表演艺术的持续需求反映了生活质量的提升和多样化，人口再生产则关乎全社会的发展可持续性。虽然都要求对生产率进行分享，前一情形仍然属于私人需求，市场机制解决的成分更大一些；后一情形则涉及社会效益，政府应该发挥较大的作用。换句话说，具有社会效益的事务，例如这里涉及的对未成年子女的照料和对老年人的照护，自然不应该让家庭独自承担。对于照料工作具有的社会收益性质，或者说关于把照料工作作为某种程度的公共服务，由社会提供或承担支出，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阐释。

既然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纯粹基于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则不足以保障这种社会必要服务的充分供给。而这种服务的供不应求状况，常常导致该领域就业活动的非正规化。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只能依靠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非熟练劳动者，特别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满足对这类服务的需求。这些新来乍到者通常接受较低的保留工资和不尽如人意的的工作条件，从而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与此同时，这种非正常劳动力供给的时间窗口也是短暂的。一旦这些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和更好的适应性，他们就会离开这个岗位，需求者只好转向下一批新成长劳动力。

在这种条件下，照料岗位必然会始终处于从业者报酬不充分的状态，同时服务质量也难以得到提高，这个领域的劳动力供给愈加短缺，导致家庭时间预算无法摆脱紧约束，总体上表现为一个恶性循环。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根本出路，是让照料工作乃至更多的家庭发展活动获得更多的公益性待遇。从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的路径和步骤可以简述如下。

第一步，把目前家庭成员承担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其中的照料活动应该按照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思路予以扶持。具体来说，通过补贴和其他优惠措施，鼓励发展托儿所、养老院和社区照料机构，使成本真正降低到家庭可以承受的水平，从而解放家务劳动。这种做法的必要性不仅在于照料工作具有的社会收益性质，还由于家务劳动社

会化可以显著增加经济总量。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显示，全国城乡居民所从事的以家务劳动为主的无酬劳动时间，相当于有酬劳动时间的 61.4%。这就是说，无酬劳动中任何一个部分为市场活动替代，都意味着相同比例的 GDP 总量增加。

第二步，把目前家庭或者市场承担的部分职能，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我们先来认识以下三个特征化事实。其一，经济学家发现，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与教育阶段成反比，即越是在低年龄的教育阶段上，社会收益率越高。不言而喻，学前教育具有最高的社会收益率。其二，相对于私人收益率，社会收益率高的活动领域，正是政府承担支出责任之所在。其三，在较低的年龄阶段上，照料与教育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通常是融为一体的。根据这三个事实判断，以特定的方式把儿童照料作为基本公共服务，适时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或实现这个阶段的全覆盖免费教育，可以显著缓解家庭预算约束，同时达到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以及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的多重要求。

第三步，营造家庭友好型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这正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要求的内容之一。除了承担必要的财政支出责任予以扶持之外，政府还应该通过监督法规的执行、制订行业发展规划、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方式，把促进家庭发展纳入自身常规的职能范围。在中国，社区是最接近家庭，同时履行部分政府职能的社会组织，直接参与照料活动的组织和运行，具有天然的便利，也能够产生恰当的激励。此外，企业把遵守劳动法规、承担社会责任和改变发展取向结合起来，把员工福祉纳入企业经营函数，可以在拓宽家庭财务预算和时间预算方面有所作为。

(责任编辑：西 贝)